

老藤以草木为镜 照见山乡巨变

文 王小柔

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老藤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我甚至无法把他的作品与东北文学视为同一类，粗犷悲情的文风在他这儿全然没有，反倒是大自然的清新醇厚叠加着尘世中人们努力生活的模样。他的长篇小说《草木志》不仅斩获“五个一工程”奖，更被视作“新时代山乡巨变”书写的标杆之作。而我们对“乡村振兴”这个文学主题的讨论是从老藤说“我最喜欢出子”开始的。

与老藤畅聊的几个小时里，感受到一位作家对大地的深情。他经常把自己切换成提问者，冷不丁问我一句：“你吃过江葱吗？”在我脑子里刚飘过一棵大葱的时候，他讲起江葱炖鱼特别香，我不由自主地咽了一下口水。“你知道炊烟有五种颜色吗？”老藤又问在我的知识盲点上。他给我普及了一下，不同的柴火烧出来的炊烟颜色是不同的，这些烟在夕阳、朝霞中颜色变化得更丰富。他用诗一样的语言沉浸在曾经生活的一段时光里，他说小兴安岭的一块湿地是他作品中的“保护地”，湿地边上开满“钢笔水花”（鸢尾花），像一簇一簇蓝色的火焰，还有红蓼花、野百合花竞相开着，泡子里水鸟翔集。当他钓完鱼，扛着鱼竿往回走，顺路草丛里拴几个野鸭蛋，嘴里哼着小曲，看着村庄里飘起的炊烟。那一刻的幸福感深深打动着我。“你知道什么树的柴烧完没有烟吗？”老藤自问自答，给我普及植物知识，他说红柳枝干燥后烧起来是无烟的。紧接着，他停顿了一下：“人怎么能跟大地隔开，那就没有生命力了。”

在一个春天的上午，文学包裹在草木里，我们兴致盎然。

老藤的作品扎根东北黑土地，以乡土为纸，以草木为墨，勾勒出乡村振兴的壮阔图景，更以深邃的人文关怀与生态哲思，为文学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他典雅明证的美学风格，为粗线条的东北文学增添了温柔和细腻的色彩。他在用文学深耕乡土中国的精神原乡。



老藤

本名滕贞甫，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主席团委员。出版有长篇小说《战国红》《北地》《北障》等十一部，小说集《黑画眉》《熬鹰》等八部，文化随笔集《儒学笔记》等三部。

植物隐喻与乡村寓言
草木有情也更有智慧

一位连笔名都是植物的作家，确实跟自然紧紧相连。问及这个名字，他提到五指山的“过山藤”，那是热带雨林中的老藤，它能包裹住巨石，能缠绕大树，甚至能跨过一条小河横空长到对岸去。老藤说，这种植物有耐力、有韧性，生命还长。他还提及一种“老藤红酒”，用于酿酒的葡萄，它们的藤龄必须在35岁以上，葡萄藤的根系深入地下几十米。当看到虬曲苍劲的老藤，他想，创作的过程不就是酿造老藤葡萄酒的过程吗？于是笔名如人，“齐万物，等生死”，他说，把这一观念投射到乡村田畴，人们便会放低视角，来下乡村振兴这盘大棋，自然也就少了些居高临下，少了些想当然。老藤曾写过一篇创作谈叫《做万物之歌者》，他认为作家在写人有了审美疲劳之后，可以把笔触转向那些可爱的动物和植物，这样会给她创作打开一扇别开生面的门。

中国古代称百姓为“草民”，意思是稼穡者如同田野上的植物，自然生长就是它的命理。老藤斟酌再三，把当时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依依墟里烟》改名为《草木志》。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老藤站在黑龙江畔那块他认为最美的沿江湿地边上，心里生出几多感慨。因为与湿地毗邻的一座村庄，几十年前人声鼎沸，如今已经十户九空，村子里不要说人，就连鸡、鸭、鹅、狗都见不到，村庄如同死去一般。这是他曾在村民家吃过野鸭蛋炒江葱的地方，那种别样的鲜味让他至今难忘。老藤在村里转了转，在闲置的村小学遇到一位穿着迷彩服、自称是守村人的大伯。他说村里加上他共有四位老年人，都是在城市里住不惯、自己回来的。村里小学撤并，孩子到市里上学，大人都在那里买房子住，屯子自然就荒了。村民的地也都包出去了，承包人平时不用来，播种来一次，施

肥、打除草剂来一次，收割来一次，一年开着年来三趟，“突、突、突”地农活就完事了。

老藤问老人为什么不走？他说自己留下来给村民看房子，房子需要有人经管，不然用不了几年就不成样子了。大伯掀起右侧衣襟，露出腰里挂着的一大串钥匙。他身上挂着21把钥匙，这是21户村民的家。老藤觉得这座村子将来不会存在了，走出去的年轻人也不会再回来。可大伯认为叶落归根，走出去的人到了时候自然就会回来，因为列祖列宗都睡在村东边那片坟地墓里。

与老人的交谈让老藤明白了一个道理，乡村的生机不在外部，而在于内心不死，就像其貌不扬的洋葱头，明明已经烂了几层，只要接触了湿土，仍然会长出绿色的葱叶来。在构思《草木志》时，他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这座村庄。

老藤写过几十种动物，也写过很多种昆虫，《草木志》则开启了他对植物的书写。在老藤眼里，每一株草木都了不起，草木有情亦有道，人类只要俯下身去观察、去感受，就会发现草木的品格是多么的纯净、自然、高尚。

自然书写的文学实验
工作经历是最好素材

在《草木志》开篇的引子里，出现了一位白衣飘飘的年轻女老师，这位老师对主人公影响很大。老藤说，这位老师正是启发自己爱上大自然的生物老师原型。老藤就读的乡村中学很闭塞，物质也匮乏，学生每天灰头土脸，年轻女老师带他们观察自然变化，让他们保护生态，这样的理念在老藤心里深深扎下根。因为那个年代，很多人打猎，甚至动物园对动物的介绍最后一句都是“味道如何”。

上世纪70年代初，胶东半岛的主食以地瓜和地瓜干为主，地瓜虽好，但久食烧心的感觉很难熬，不得已，老藤全家就搬到了以小麦、玉米为主食的黑龙江松嫩平原。他说自己算是末代闯关东的人。他少年时很喜欢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看久了，也尝试着写了一组诗投给《黑河日报》，很快发表，这些青涩的小诗坚定了他的文学信心。他开始写散文、写文学评论。

伴随着写作，老藤的仕途也开始起步，从股长开始，经历过二十多个工作岗位。他在五大连池工作了八年，先后在文教局、组织部任职，后来担任市委办公室主任。在旅顺工作了十四年，先后担任过区委办主任、区委宣传部部长和纪委书记等职。这些经历对于老藤来说太重要了，他的长篇小说《北地》《北障》《战国红》都是工作经历的折射。《北地》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主人公担任过十几个领导职务，如果没有多岗位的工作体验，他很难完成这部作品。2002年，老藤到江西的凌源市挂职任副市长，十七年后，这段扶贫工作经历沉淀发酵，当他动笔创作《战国红》时，就有了水到渠成的感觉。

或许是年少时那位生物老师在他心里播下的种子，老藤在小说中写了很多动物的传奇。比如《北障》中的瘸腿狐狸和猞猁，《黑画眉》中的驴，《北地》中的孢子、《青山在》中的白虎和豹子，《熬鹰》中的青鹰和凤鸢、《扎汉宫》中的白狐狸、《远东第一犬》中的警犬、《野长城羊事》中的山羊，都充满灵性和神秘感。老藤以文学的方式构建起神奇莫测的大东北自然志。而在《草木志》一书中，他将人和草木比喻，将东北草木的特征和东北乡土人物的性格相对照类比，呈现了东北大地上人与自然的浑融。小说中，东北大地上的草木不是风景和闲笔，而成

了人物性格的一部分，人物也成了东北大地的风景，通过这样的书写，大地和人物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和自然不再是对立的两端，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

现实与历史复调叙事
让小说结构充满张力

对自己的作家身份，老藤有着明确的定位：题材开拓、思想探索、手法创新，同时还要给读者带来启发和心灵上的愉悦。这标准挺高的，但在老藤这儿似乎路就该这么走，绝不重复。于是读者能看到：“在北大荒苍茫的柞树林间，绿宝、雄蚕蛾、狼蛛——三位‘快手’猎人，与村花田娥的命运相互交缠。当蚕场在时代洪流中飘摇，他们的选择与蜕变，也恰似柞树林中的蚕虫，吐尽一生丝，终成茧中蛾……”这是《天虫》中的文字，人与昆虫在某种时刻互喻；到了《刀兵过》，老藤讲述了自清末至改革开放初期，酷奴堂医馆两位具有儒家理想道德人格的乡贤的人生遭遇；而《铜行里》讲述的是铜匠们在现代中国的百年传奇，他在小说中塑造了奉仁尊礼、义薄云天的志士群像；小说《北爱》是在中国大飞机C919成功首飞之际推出的，他在小说情节里设计了十幅画，瞬间让文学与科技共舞，读起来不生涩、不突兀。

老藤说最近他创作的一部小说是写AI（人工智能）工程师的，主人公研发智能机器人，但机器人开始不听其指令，甚至要反噬人类，这让工程师陷入焦虑和恐惧。医生建议他到大兴安岭森林中换一种生活方式，工程师在这里向自然、向传统文化学习，最终找到了治愈焦虑和恐惧的解药。

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在探索结构的艺术，试图在帮助读者发现他们没看到的内容——写飞机制造，他就在“沈飞”采风；写司法题材，他就经常与检察官交流。老藤认为，只有开拓了生活，才有题材上的开拓，作家不能总重复自己。他觉得很多有价值的题材写都写不完，作家在增加文本厚度的同时，需要增加阅历的厚度，闭门不出光靠想象是写不出反映时代特征的好作品的。

热爱自然的老藤也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他在从沈阳回大连的火车上写出了《孔子另说》，深入浅出地对儒家学说进行阐释和辨驳，汲取精粹，摒弃偏见。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他的头脑像永不停歇的齿轮，不停旋转之后又有了新的创作题材。

他讲起前不久去贺兰山黑石砬，在光秃秃的山上看到巴掌大的一簇野花，花上竟然飞来一只蜜蜂，体感温度依然很冷，蜜蜂怎么就知道这里有花朵，它从哪儿来的呢？老藤说，这就是自然之道。

老藤的创作轨迹犹如一部东北编年史。《北地》以三代拓荒者勾勒新中国建设史诗，《北障》在猎人与山林的对抗中探讨生态哲学，《战国红》将扶贫叙事升华为信仰寓言。而《草木志》的诞生，标志着他完成了对乡土文学的范式革新。

打破“人非草木”的传统认知，以“草木若人”重构叙事伦理，这种尝试被评论家王卫平称为“新乡土叙事的语言学革命”。老藤说：“作家的笔是鼠标、犁铧、号角，更是棱镜。”在小说《草木志》这面棱镜中，我们既看到了乡村振兴的复杂光谱——历史与现实的纠葛、生态与发展的博弈、外来与本土的角力；更照见一位作家的精神跋涉：从儒家士人的济世情怀，到生态主义者的文明反思，最终抵达“万物之歌者”的文学境界。当城市化浪潮席卷乡村，老藤以笔为锚，将文学的根系深扎于黑土地，为时代留下了一份兼具诗性与思辨的乡土备忘录。

老藤访谈 乡村振兴的生态观照 带读者回到精神原乡

王小柔：您的小说经常用到多重叙事的手法，历史和现实双线并行，为什么如此写作，能否从技法和艺术层面解释一下？

老藤：作家要会灵活“变焦”，村庄、驿站文化、君子文化和现代社会交融。举个例子，塔头俗称塔头墩子，是北地沼泽一种高出水面的草墩，据说它们寿命长达10万岁，看似普通的塔头，上面站过谁、落过什么飞鸟，经历过几多风吹雨淋，一概无法知晓。但可以肯定地说，秦时明月照过它，汉时秋风拂过它，肃慎、女真的马蹄踏过它，历经千年万年依然生机不减，越长越高，柔软的躯体充满了钟乳石般的坚毅。塔头的生成是时间沉淀与积累的结果。沼泽地里各种藁草的根系死亡后又生长，再腐烂，再生长，周而复始，长年累月便形成了腐殖质层——如果连片，就是恐怖的漂筏；如果独立，就长成了塔头。植物能将古今相连，它比作家懂得叙事的艺术。

王小柔：您觉得人和植物之间有什么关联？

老藤：对动植物没有尊重的人，内心不会柔软，也不会和人好好相处。我觉得植物和人一样，都有自己的情感。我们小区有一棵杏树，有一年开的花特别明艳，结了满树的大杏子，特别甜。这原本是美好的一个景色，但人们有的拿棒子打，有的折枝，甚至一个收废品的大爷还用一把特别钝的斧子砍下来一根枝杈，放车里拉走了。我很伤心，估计杏树对它也很失望，所以从转年到现在，每年它只开很少的花，结小小的果实。植物也有灵性，我写了篇文章叫《杏树的脾气》。人应该对大自然有一颗感恩、敬畏之心，切不可让胜者自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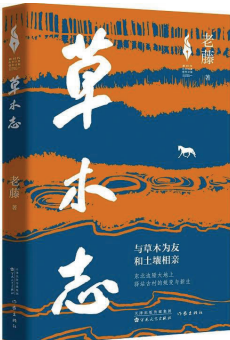
王小柔：大自然教给人类很多。您认为对于自然界，作家担负着什么责任？

老藤：我觉得，一名优秀的作家，应该同时也是思想家和哲学家。不能总拘泥于已有的思考，要有新的发现、新的思想意识。作家要守正创新，努力去开阔自己的视野，深入基层体验生活，这样才能激发创作上的进取心。在生活里设立阶段性

目标，写出对这个时代人民有价值的作品。

王小柔：您觉得AI时代来了，对作家和读者的影响是什么？

老藤：AI势不可挡，作家必须面对。孟子曾说“万物皆备于我”，AI肯定会淘汰一部分重复性工作，它取决于计算和“投喂”，在大数据库里没有素材时，它会枯竭。人机博弈的时代，作家必须靠独立原创，来赢得一个身份。它只会已有有感觉的表达，不会有新的创造性表达，我认为AI还替代不了真正的小说家。AI写的文学作品不值得深读，但有些读者并不知道是出自AI，所以大众阅读的审美水平很有可能被拉低。文章是一个人的内心感受，一个作家一个风格，AI会模仿，会华丽地造新词，但没有“活人感”，最多也就是给人提供思路。（图片由老藤提供）



讲述

医者常怀悲悯之心，须有济世苍生之志

93岁老医生，一生从事传染病防治

文 殷秀玲

人们面对流行病、传染病，就像躲避瘟疫一样，避之不及。而作为传染病医生，必须逆向而行，义无反顾地冲向最危险的地带救治生命。于长水生于1932年，长期从事传染病防治研究与免疫预防工作，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传染病医生。他经常深入灾情一线和发病区，胸怀一片丹心，践行医者誓言，一次次精准调研、追根溯源，不达目的不放弃。他的故事值得被我们记录下来。

洪水暴发奔赴灾区
对症治疗扑灭疫情

于长水出生在河北省巨鹿县，1955年来天津学医，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市卫生防疫站（现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师从屈鸿钧。屈鸿钧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是著名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老师告诉于长水：“医者常怀悲悯之心，须有济世苍生之志。”于长水也始终没有忘记老师的教诲。

屈鸿钧提出全国“计划免疫”，于长水在该项目中脱颖而出，独挑大

梁。1958年，各地组织人员到天津参观学习，于长水在天津市医学学术会上宣读了首篇有关“计划免疫”的医学论文。

1963年，河北省遭遇特大洪灾，邯郸、邢台灾区爆发重症钩端螺旋体病。洪水迅速逼向天津，静海县台头公社（今静海区台头镇）被洪水围困，村民出现严重病患甚至死亡。公社紧急请求医疗部门派专家支援。天津市卫生局派于长水等三人专家组执行任务。

村外水天相连，已是一片汪洋。村里几乎家家都出现了病人，人人恐慌。村内泥水肆意横流，暴雨、大雨下个不停。于长水一行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塘里、水坑中，艰难行路，护堤的青壮年村民看到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像看到救星一样，立刻划船过来，送他们进村。

病人的症状是发烧、黄疸、肝肿大，发病近200人，已有5人死亡。专家组心急如焚，挨家挨户查看，发现病人大多为女性，而且没参加过抗洪的女病人居多，怀孕的妇女病情尤为严重。医生们再度调查时发现，各家各户的猪圈都在村外，水淹后把猪赶回家，女人因喂猪被感染发病。



工作中的于长水(左)

于长水快速排除了钩端螺旋体病，怀疑是肝炎。专家组立即采集病人血样检查，结果为病毒性肝炎，及时对症治疗，很快扑灭疫情。全村人不再恐慌，病人转危为安。

推动复种麻疹疫苗
诊断防治手足口病

1965年，我国开始给八个月龄的孩子接种麻疹疫苗，有效控制了麻疹严重流行。1981年，麻疹发病率反弹，于长水带领团队展开调研。孩子们在接种疫苗后五年，体内抗麻疹病毒免疫力几乎丧失，7岁以上麻疹患者占病人的50%，发病率停留在40/10万而不再下降。调研结果提出：在7岁儿童中复种一次麻疹疫

苗。但是，这个提议不符合我国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规定，即只在八个月龄儿童接种一次后不再复种。

于长水当时已是流行病科主任，面对患病的孩子，感到肩上的担子千钧重，每天坐卧不宁、寝食难安。他去过邻近城市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商量，想共同推行复种麻疹疫苗，因为该市也处于同样的发病率。然而，该市坚决执行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没能达成共识。回来的路上，于长水似乎听到了“救救孩子”的声音，那是从自己内心深处传来的。他不再犹豫，决定在天津单独行动。这个想法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支持，市政府同意拨款免费接种。1981年，全市施行小学一年级学生复种麻疹疫苗。

1982年，国内大面积出现麻疹流行，因天津市进行了麻疹复种，发病率没有上升。这一年秋天，我国疫苗接种专家组改变了规定，在全国7岁儿童中实行复种。美国也在5岁至7岁儿童中进行了麻疹疫苗复种。世界卫生组织也向各国建议复种麻疹疫苗。

1983年，天津流行手足口病，这是天津近代史上第一次爆发此类传染病，于长水负责病毒诊断与防治研究工作。项目研究团队与儿童医院、口腔医院协作，从患儿的疱疹液中分离出病毒，需要血清试剂确定类型。当时手足口病流行已得到控制，患病近万名孩子都已痊愈，病毒无法分型鉴定，研究工作陷入僵局。

传染病研究不能半途而废，否则病情再次发作、流行，仍危害人类的健康。于长水下决心弄清楚天津手足口病是哪病毒，一定要找到治疗

方案。他想到了手足口病发病多年的日本，想到了天津的友好城市日本神户市，他给神户大学写信，本间守男教授接到信后，邀请秋田大学须藤恒久教授共同协助。时隔一个月，日本医学专家受邀来津，给予长水无偿带来了鉴定分型血清和二十多份日文、英文的手足口病相关资料。

有了分型血清，于长水立即对分离的病毒作鉴定，确定了天津流行的手足口病是由柯萨奇A组第16型病毒引发的。他撰写论文，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发表。这一成果填补了中国手足口病防治领域的空白，给全国儿童手足口病流行找到了快速医治的良方。

确诊发烧皮疹怪病
创新注射狂犬疫苗

1989年秋天，宝坻县、蓟县（今宝坻区、蓟州区）出现一种发烧、出皮疹的疾病，成人发病多，男女都有。市里派出了三个专家组前往，一直未能确诊，病人得不到及时治疗，出现增长势头，引起老百姓的惶恐。

于长水临危受命。一路上，他一直在思考过敏原究竟是什么。进村后立即入户查看情况。当他第一眼看到病人腋窝前的结痂时，引起警觉，再连续检查，又发现每个病人身上都有结痂，他快速判定为这一疾病的特征。为避免误诊，他询问了多名病人，都否认是自己抓破形成的结痂。又了解到病人曾有抱柴的经历，当即确定病因——恙虫病叮咬导致溃烂结痂，引起发烧、皮疹。治疗时，专家组采血做辅助诊断试验，诊断为恙虫病，改用氯霉素治疗。病人在24小时内退烧，很快痊愈。遭受

病痛的患者称，村里来了位神医！

为进一步证实病因，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将病人血清送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热带病研究所复查，得到高度赞誉。专家说，各地都是带着血清要求诊断，只有天津是诊断了恙虫病来复查确认结果。

1990年8月，宝坻县一个村庄出现狂犬咬伤五名儿童的严重事件，患儿伤势很重，县里请于长水来现场处理。当他走进村中，几位无助、焦虑、悲伤的母亲亲刷刷地跪下来，撕心裂肺的哭声响成一片。

狂犬病的短潜伏期只在一个月內就会发病，而狂犬病注射疫苗疗法，即暴露后预防注射，通常要遵循0、3、7天和14天的时间间隔。危险的是，第四针、第五针间隔的半个月內，短潜伏期的患者可能会发病死亡。怎么办？

狂犬病疫苗属于灭活疫苗，需要注射的次数多，但注射反应比较小。于长水大胆尝试新的治疗方案，提前打完五针，让孩子体内产生免疫力。尊重科学是创新的前提，于长水成功了！救了孩子们的命，挽救了五个家庭。他立即写出《预防短潜伏期狂犬病要速战速决》一文，寄给《健康报》。文章发表后，全国有26个省市自治区的医务人员来信询问详情，他一一应答。外地被咬伤的患者及时准确地得到了救治。

66岁那年，于长水退休，又留在原岗位继续工作了五年。直到2003年防治“非典疫情”结束，71岁的他才正式离开工作岗位。但他仍在做着与生命健康有关的事，在中老年普及非特异免疫知识、增强抗病能力方面，提出了慢性疾病“发病四因素、防治两途径”的理念，造福百姓，令人敬佩。